

我行我素



杂家杂忆丛书

徐城北著

ISBN 7-80603-148-0



9 787806 031483 >

书 名 我行我素

著 者 徐城北

出版发行 山东童趣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787×1092 毫米)

11.5 印张 1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147-2/Z·12

定 价 16.80 元

我行我素（代自序）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几个人能够我行我素。比如正闹“文革”，你能坐下来看书和写书么？每个捧铁饭碗的人，能不为自己份儿内的工作忙乎么？不捧铁饭碗的人，不更得时刻关注自己和家庭的生计么？

从另一重意义讲，世界上的每个人，又人人都是我行我素的。即使干一样的事儿，干的方法中都带有性格的不同色彩——这色彩就是他的“素”。

我觉得，最好能有一种“居间”的局面：所干的是好事、正事和大事，是国家民族所承认和所需要的；同时又在最大限度上显现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就把“外界”和“内在”统一起来了。

我为了赢得这一“居间”的局面，曾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去追求，曾走南闯北浪迹天涯，曾呕心沥血做过许多无用功。最后总算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调

回北京，进入到中国京剧院，干上向往了许多年的京剧编剧。至此，可以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素”。

可事实上，就在我一个小小老百姓苦苦寻觅的同时，国家也在寻找走一条“我行我素”的新路。为什么在“十七年”中九曲十八弯？为的就是寻找这个“素”（——今天理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惜当时一直没找到，便孤注一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没想到越这么干就和预期目的离得越远，最后闹得民心都散了，几乎众叛亲离。所以说，国家走上今天这一步确实不易，它给自己选择的这个“素”，也就成为老百姓个人之“素”的最大基础与背景。

我承认这个基础，我更由衷赞美这个背景。没这个最大的“素”，我调不回北京，我干不上今天这份儿工作，我就无从找到自己的“素”。

找到了这份儿工作，并不等于我就能把“素”紧握在手中。因为国家也是刚刚找到这个久盼之“素”，因此认识和执行中不可能没摇摆。国家倘一摇摆，个人怎能不受影响呢？比如 1983 年，文化部一号召“承包”，戏曲剧团立刻散了架，演员忙挣钱去了，剩下编剧导演没事儿干也没人管了。这时，编导的“素”全被架空，明天是否还倚仗这个“素”吃饭都很难说了。

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自我改行——把胆魄和智慧都

转移到著书立说上来，“素”渐渐还从研究京剧自身深化到透视传统文化中去。这么一调整，这十多年一气呵成，好像没再碰上什么大钉子。

我给自己找到了“素”之后，依据对外界的观察，努力争取外界可能给予的一切支持——于是个人也就这么“行”了起来。既是充分靠自己，更是时刻背靠身后的大环境。我觉得很痛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行我素”者，比“循规蹈矩”者更明智也更进步，工作成果也更符合国家的需要。

我行我素不等于个人主义。恰恰相反，它是提倡在新形势下，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发挥“人自为战”的优势，从国家的最小单元（——人）当中锤炼出最高的素质。如果这些最小的“一”都提高了效能，那么最后的“和”就势必大于和优于诸多“一”的简单相加。

但是，任何的“一”都不会走一条直线。书中分成几个大的部分，实际也就是我个人在我行我素过程中的几次摇摆。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主动的。时间越往后推移，主动的成分就越多。

不知您读了本书之后，是否能看出这样的一条贯穿线？

愿您也能帮助身边的人，尽快实行起我行我素。如何？

作者

1997年4月14日北京



目 录

- 1 我行我素（代自序）
- 1 百转千回去复还
- 3 品味青铜器
- 9 试笔唐花坞
- 14 沉醉旧体诗
- 19 学演《红灯记》
- 28 教授政治课
- 36 寄情永定河
- 44 附：《骆驼岭》第七场片段
- 47 天女散花报屁股
- 49 你变我也变
- 61 您哭我不哭

69 国宝乎活宝乎

77 串门乎悟道乎

87 水土流失了

93 万事开头难

97 歪打正着抓根本

99 敢说“舍我其谁”

111 与名伶平起平坐

125 “品戏斋”宣言

131 淡出与淡入

139 马后炮

143 不妨恢复前门区

147 为李世济写戏

165 老字号是什么

169 做“大”与做“小”

175 从《说园》到《戏品》

179 还得咬几年牙

181 拼一个“性命交关”

187 做一个“梅兰芳三部曲”

197 不是“逗你玩”

204 从“又一个”白求恩说起

209 我的“素”是什么

- 211 “几不像”
222 难得闲适
228 收支平衡
235 没空儿生病
239 当众孤独
244 “三不老”与“单出头”
- 253 七十岁以后
255 写好“小品文”
263 探求“小炒肉”
267 书画相娱
271 当好外公
- 277 一朝“没有事了”
279 秀在骨里
287 天下真小
301 友情常在
307 大人小事
319 感谢师傅
326 怀念母亲
344 附：沈从文先生写给我的信
350 附：母亲为孙女代笔写给妻子的信
- 353 后记

百转千回去复还

青春岁月颠沛流离，情绪上的袭扰远甚肌肤上的折磨。

我成长在北京，但不能也不肯在北京就业，而是“百转千回”绕一个很大圈子，才最终回到北京。是那个时代折腾我，我也豁出去了挨折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品味青铜器

您知道什么是“单位”么？辞典上解释说：一、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二、指机关、团体或属于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如果以解放后“十七年”社会学的观点看这个词汇，辞典编者肯定是个老学究，根本没说到事物的本质。那年月，每个城市居民都要同时受到两层管辖。一层是户籍，就是你住在哪里，得让管“片”的民警管理你的“八小时以外”。二是要有“单位”，它则是管理你的“八小时以内”。“以外”和“以内”加到一块儿，你全部时间（甚至包括吃饭、睡觉）就都毫无例外地处在管辖之下。

我1960年高中毕业，挺好的成绩却只考上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属二类学校，但总算是四年制。这个学校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一切白手起家，简陋之极，我很不高兴。刚上没几个月，就赶上

院系调整，学院就动员一批身体不太好的同学休学，其中有我，因为体检表上注明中学时代有心脏病，体育免休。我没犹豫，休就休吧。心想正可以准备一下功课，明年另考一个好大学。第二年，休学期满，工农学院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后者则动员我退学。父亲找到学院去问——是不是因为双亲被打为右派的缘故。回答否，只说院系调整，学生名额多了，一定要减。校方还举例说，和我同班有一个病歪歪的干部子弟（女生），同样也得退学。父亲没话，回来了。我本来也不太“在意”这学校，就办了退学手续。可后来没多久，学院就又把那女生“请”回去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幕，她完全就是一个“托儿”。

且只说我。一回家，表面上再没人管我了，可实际不然，民警会时不时进家找我“谈话”。当然，态度是客气的，只是问问平时的生活安排，并不问我对未来的工作设想。那年月找工作很难，如果街道上分配到去某工厂的名额，那真像一块香饽饽，多少人争啊抢的。最后，也只有那些出身好而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的青年，才轮得上入选。

对此，我则不屑一顾。对于前途，我是既坚定又茫然。说坚定，则一定要干“文化工作”；至于到底干什么，则又心中无数。沈从文伯伯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对我父母说：“弟弟（他总这么称呼我，我父母也这么称呼他的儿子）应该抓紧年轻的时候多学些



“文革”中沈从文夫妇在湖北干校。沈从文对“文革”充满怨恨，但对文物研究却充满热情。他常对子女说：“学点文化，否则年纪一大，就记不住了。”于是，我一度全面开花——诗词、国画、京剧……什么全来，到处“拜师”。搞了一段，心里也没了主意，父母遂又问计于沈。

沈对我父母说，“问问弟弟，愿不愿意跟我学文物研究？”

可文物（文艺）的范畴也太宽泛了。

“那么，不妨从青铜器的欣赏和鉴定入手，就先看一些这类书吧。”

沈开列了一长串书籍名单，有铅印的，也有善本的。沈还向我父母说，“弟弟古文不错，能看没有标点的古书；听得懂我的湘西话，看得懂我的毛笔字。如果要干，就要趁早，趁我现在还有挑选助手的权力……”

于是，我拿着这份儿书单，每天骑车到北海旁边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一去就是两个半天，因为中午回家吃饭。把书包存在门口，只带笔记本和一个喝水杯子进去。

我连看了一个月。那时脑子真是好使，书上的文字并不难懂，只是太枯燥，读得我痛苦不堪。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文化”和“文艺”的区别。敢情我的性情是倾向艺术的，我倾倒于热闹和疯狂，而不堪于研究文化的坐冷板凳。

我转而注意图书馆中的其他读者，绝大多数都有“单位”，他们按时来也按时走，他们看书是分内的工作，看多看少一个样，快看慢看一个样，闭眼睛休息也同样挣工资。

但我发现期刊阅览室中有一位不肯按时走的读者：他姓陈，男性，年纪二十岁上下，驼背很厉害，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天一早来，闭馆才走，中午都不回家。他每天借阅各种新到期刊中的文艺作品，不断给各种期刊投稿。投中的不多，且“块头”很小。

我和他渐渐认识了，他奇怪我为什么要读青铜器

的书，我如实以告，他摇摇头，“太苦了。”

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现在先发表些小文章，将来到报社、杂志社当编辑。”

我去了他的家，就在府右街的南段路以西的胡同里，家境并不太好，给他在院子里单盖了一间简易房屋，十平米，一尘不染。作为男性，也有些洁癖了。

我整天看青铜器（沈特别要我关注青铜镜），同时也看他——应该说，他是我的“又一面镜子”。他的确是苦，可我又何尝不苦？如果我跟随了沈伯伯，大约此生就要每天如此机械地生活了。

我知道青铜器对于中国历史的作用，但又怀疑做好这一工作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报纸广播中每天喊的，都是人的革命化；在现实中，更有一个如何吃饱饭的问题。相形之下，青铜器就显得过于厚重，它的铭文也显得过于斑驳了。我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力气已经花尽，目力所及，肯定是看不透的了。

我犹疑并痛苦起来——母亲发觉了我的情绪变化，让我有什么话直接找沈伯伯说。我去了，沈问我：“还读得进去么？”

我不说话，是不能回答。

当时是夏天，沈的那间小屋子太热，吃完晚饭，他和我并排坐在他的门口，那里可以看见一角天空。他说：“你看，天上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这颗是茅盾，那颗是巴金，又一颗是老舍……”

我知道解放前在国统区有一个“四大作家”的说法，除了上边三位，最后还有他。我问：“您在哪儿呢？”他举起那只小而胖的手，摇了摇说：“早没有了，我现在在故宫博物院当说明员，就很好。真的，要想当好说明员，还不容易呢……”

沈伯伯自一解放就改换了他的工作，他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可我，学了半天青铜镜，可镜子中却照不见我的人影……